

# 前蘇聯軍事思想的演變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獨立國協(CIS)不能成立統一的武裝力量，但俄羅斯已經在繼承了前蘇聯大部軍事遺產的基礎上建軍，它的軍事思想值得研究。

俄羅斯的軍事思想，當然有其繼承自蘇聯的部分，而蘇聯的軍事思想，有些也是帝俄軍事思想的延續。從帝俄而蘇聯、而俄羅斯共和國，其軍事思想有一脈相承的部分，但也因應現實環境而有所改變。本文將探討前蘇聯軍事思想的演變。

一國的軍事思想，和其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觀念有關。這種觀念的形成，又和該國的歷史、地理不可分。帝俄就橫跨歐亞二洲，蘇聯更把面積擴大到二、二四〇萬平方公里。但歐俄西面、亞俄南面，地勢平坦，缺少天然要塞，易攻難守。十三世紀蒙古人席捲了俄國大陸；十九世紀拿破崙攻陷莫斯科；二十世紀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兩千萬俄人喪生。這使得俄人對國家安全具有神經質的敏感。因此，百分之百的安全，不能令其滿足，其領導階層追求的是百分之二百乃至百分之三百的安全保障。前美國國防情報局(DIA)局長威爾遜將軍(Samuel Wilson)指出，在蘇聯當局的觀念裡，(蘇對美)七比一、八比一的優勢尚不可靠，十五比一的優勢方可稍微安心。①爲了本身安全，不斷在周圍製造緩衝地帶，實際就等於向外擴張。

從十五世紀末以來，俄國就在尋找出海口(溫水港)。「俄國要水」就成爲其傳統政策。一七〇三年，彼得大帝

註①「蘇聯外交動態——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報告書」，轉自產經新聞夕刊(日本)，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第一面。

Peter I, the Great) 在尼瓦河 (Neva R.) 岸建彼得堡，開啟了通往歐洲之窗。一七二二年，俄國獲得波羅的海的霸權。一八六〇年，帝俄從清朝割得海參崴 (Vladivostok)，這個海港目前是蘇聯太平洋艦隊根據地，西伯利亞鐵路的終點，但它每年仍有五個月的封凍期。蘇聯和帝俄時代一樣，基本上是一個大陸國家，仍在尋求不凍港。

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政權成立後，其軍事思想也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依照大陸人士杜一平的說法，克勞塞維茨 (Carl Von Clausewitz) 的戰爭論是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重要的理論來源之一。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軍隊」、「歐洲軍隊」、「戰爭短評」等論著以及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撰寫的許多有關軍事問題的條目裡，都蘊含有豐富而精闢的軍事哲學思想。

據我們所知，恩格斯是共黨初期領袖中唯一懂得軍事的人。杜一平說，恩格斯認為戰爭與政治不可分，戰爭產生於政治，戰爭是一種特殊政治，政治孕育著戰爭，決定著戰爭，且影響戰爭的整個進程；經濟是戰爭的基礎，戰爭既可阻礙、破壞經濟的發展，又可保障、促進經濟的發展。<sup>②</sup>

杜一平在文章中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研究戰爭與政治、經濟的關係，而且把它放到社會文化背景中研究，認為，私有制使掠奪戰爭成了經常的職業，全世界工人的聯合終究會根絕一切戰爭，暴力是實現階級社會中的革命的必要手段，擁護革命暴力，反對反革命暴力。杜一平強調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思想以及作戰和建軍原則中運用唯物辯證法，因而有下述一些概念：軍事科學是新的社會關係的必然產物；戰術是由軍事技術水平決定的；新的生產力是作戰方法上每次新的改進的前提；主張消極防禦的人是缺少辯證法的；軍隊的組織編制取決於人民和武器的狀況；任何軍隊沒有軍隊知識就無法作戰等。

馬恩思想或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對蘇聯的軍事思想當然有其影響。不過，列寧本人也和馬恩一樣愛好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據說，戰爭論中所謂「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手段的繼續」：「一個征服者總是最愛和平的，他最希望兵不血刃的進入被侵略國家」等等詞句，對列寧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此外，史達林在德蘇戰爭中所頒布的「永久性作戰因素」五大原則（見後述），也不能說和戰爭論毫無關係。

蘇聯職業軍人的戰略思想家，也受到克勞塞維茨很廣泛的影響。例如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實際領導蘇聯戰略思想的夏波希尼可夫 (Boris M. Shaposhnikov, 1882~1945) 就是克勞塞維茨的信徒。他曾經說：「如果戰爭為政治之延長，

註② 杜一平，「論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的演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大連），一九九一年第四期，五〇九頁。

註③ 同註②。

僅用另外手段而已。則和平亦為鬥爭之延長，亦僅用另外手段而已。」<sup>④</sup>  
應該說明的是，從帝俄到蘇聯的軍事思想，也受有中國的孫子兵法 and 成吉思汗大迂迴包圍戰略的影響。

在上述歷史、地理因素及各種軍事學說影響下，就形成蘇聯帶有共黨色彩的軍事思想。

首先是戰爭觀。共黨認為戰爭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只有階級社會消滅，戰爭才能消滅。列寧在「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一文裡這樣寫道：

「社會民主黨人過去和現在從未用傷感的觀點來看待戰爭。社會民主黨堅決譴責戰爭，認為它是解決人類爭端的野蠻辦法，同時社會民主黨也知道，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只要人剝削人的現象還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滅這種剝削，我們是逃脫不了戰爭的。」<sup>⑤</sup>

在這種戰爭觀下，共黨就依階級觀點把世界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又依階級觀點把戰爭分為兩種。史達林時代的黨史上這樣寫著：

「布爾什維克並不反對一切戰爭。他們只是反對掠奪性的戰爭，只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布爾什維克認為戰爭有兩種  
(一) 正義的，非掠奪性的，解放的戰爭，其目的或是在保衛人民抵禦外來侵犯及奴役人民的企圖，或是在把人民從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或是在把殖民地 and 依賴國從帝國主義者壓迫下解放出來。

(二) 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其目的是在侵略和奴役別的國家，奴役別國人民。

布爾什維克是擁護前一種戰爭的。至於後一種戰爭，那麼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進行堅決鬥爭來反對這種戰爭，直到實現革命和推翻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為止。」<sup>⑥</sup>

註④ 夏波希尼可夫於一九〇九年畢業於尼古拉夫斯基參謀學校，帝俄時已任上校軍官。俄國革命後，自一九一九年至內戰結束，蘇軍戰略，事實上均由夏一人控制。曾兩任參謀總長及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著有維斯杜拉河畔上與陸軍之腦等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之高級將領幾均為其門生，尤以朱可夫（Georgiy K. Zhukov）和瓦西里夫斯基（Aleksandr M. Vasilevsky）二元帥最為著名。

註⑤ 列寧全集第八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五三〇—五三一頁。該文寫作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十日，原載於無產者報第七號，其時尚在社會民主黨（共黨前身）階段，故云。

註⑥ 一九三八年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譯本，二二七頁。該書亦譯簡明教程。

根據日本的研究，儘管蘇共於一九六一年十月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綱」上，鼓吹現代的基本問題是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戰爭危機的唯一源泉是帝國主義，對人類最可怕的犯罪是世界性核戰爭的準備，而最迫切的任務，就是防止核戰爭的爆發。然而，在這次大會後，於一九六二年出版、被視為集蘇聯軍事戰略思想之大成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帥（Vladimir N. Sokolovsky）的蘇聯軍事戰略一書中，明顯的是以全面核戰的遂行方法為主體，幾乎看不到戰爭抑制理論的踪影。<sup>⑦</sup>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共產黨認為，人類的戰爭只能隨著人剝削人的階級社會的消滅而消滅，這只能靠共黨領導的暴力革命（當然包括戰爭）來達到。那麼，戰爭抑制理論就無由發展了。

蘇聯軍事思想的另一個特徵，是戰爭與政治不分、戰爭與和平不分。認為戰爭是政治之另一形態（暴力手段）的繼續。戰爭是流血的政爭，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一九二一年伏龍芝（Mikhail V. Frunze, 1885~1925）在一致的軍事思想與紅軍（*Edinaya Voennaya Doktrina I Krusnaya Armiya*）一書中，就是從政治和軍事技術兩個層面來闡釋軍事思想。

列寧曾把和平認作兩次戰爭中的「暫息」時間，他說：

媾和是積聚力量的手段。

和平是爲了準備戰爭的一種暫息方式，戰爭是獲得較好或較壞和平的手段。

要極力抓住你們所獲得的暫息時機，那怕是一小時的暫息時機也好，以便同遙遠的後方建立聯繫，在那裡去建立新軍隊。<sup>⑧</sup>

或許與此有關，列寧特別注重退卻戰略或戰略退卻。他說過：

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卻，要得到勝利是不可能的。

現在連頭號傻瓜也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這個讓步加強了我們的實力，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sup>⑨</sup>

照史達林的說法，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經過了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的第一階段、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同年十月的第二階段，進入十月革命以後的第三階段，目的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個專政作爲據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

註⑦ 日本內閣調查室編，一九六四年蘇聯年報（東京），日刊勞動通信社印行，四一三頁。

註⑧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列寧在俄國共產黨（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

註⑨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爲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赤俄與德國單獨媾和之條約，赤俄割讓巨大的西部領土，獲得「恥辱的和平」，但藉以擺脫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沉重負擔。

帝國主義。<sup>⑩</sup>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世界共黨第一次會議發表的「莫斯科宣言」說：「我們時代的主要內容是由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開始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總之，共產黨認為俄國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革命就進入世界革命階段，而蘇聯就是這個革命的根據地，因而蘇聯的軍事戰略和共黨的革命策略就不可分。

曾於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任蘇聯外交部長的維辛斯基（Andrey Ya. Vyshinsky, 1883~1955）說：

外交是一種事務性的、和平的、與軍事不同的作戰工作，它由一國政府機關及其國外代表和官員來執行以完成該國外交政策的任務。<sup>⑪</sup>

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講授「現代國際關係史」的蘇聯教授庫達科夫（L. N. Kutakov）把對外政策看作戰略，把外交看作策略。他說：

對外政策是一個國家及其統治階級在對外關係中所追求的目的和所保衛的利益，以及該國為達到這些目的和為保衛這些利益，所採取的方法和手段的總和。<sup>⑫</sup>

對於外交，庫達科夫的解釋是：「外交是國家借以執行對外政策的一種方法和手段。」<sup>⑬</sup>如此一來，蘇聯的革命策略、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就常常三位一體，混然而不可分。它們都站在階級立場上來看待和對待一切。

另一點應該提及的是，布爾什維克不是靠自己的軍隊奪取政權並在內戰中擊潰反對者的。包括杜哈切夫斯基元帥（Mikhail N. Tukhachevsky, 1893~1937）以及前文提及的夏波希尼可夫元帥等，都是帝俄時代的軍官。布爾什維克既用之又不信任他們，於是在軍中派遣黨代表予以監視，這就有了所謂黨軍關係。不過，蘇聯的軍隊任務不僅是保衛國土，還要推行革命，於是那個黨軍關係，就一直延續下來。即使在黑魯曉夫的「解凍」時期，總政治部還在各軍區、艦隊、各軍事學校等加強政治作業、召開各種會議，以對抗西方的意識形態攻勢。<sup>⑭</sup>更不用說有新史達林主義之稱的布里茲涅夫時代了。注重黨軍關係、政治教育，也應為蘇軍特色之一。

註⑩ 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第三集，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十月輯印，二一四～二一五頁。

註⑪ 轉自新名詞辭典「外交」條，上海春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〇〇七頁。

註⑫ 庫達科夫，現代國際關係史，中共根據庫氏俄文講稿譯成的中文本，一九五八年九月版，二頁。

註⑬ 同註⑫。

註⑭ 參同註⑦，四二一～四二三頁。

列寧強調，對敵鬥爭的方法，應該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變化。<sup>15</sup>因而從紅軍建立以來，隨著時代背景及武器的發展，蘇聯的軍事思想，已有過多次改變。例如內戰期間（一九一八至二〇年）注重正規軍與游擊隊的配合作戰。德蘇戰爭期間注重精神因素及數量優勢。當時史達林身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總理）兼紅軍最高統帥，曾發布五種永久性作戰因素，即：（一）後方之穩定；（二）軍隊之士氣；（三）師之數量與質量；（四）武裝部隊之兵器；（五）指揮官之組織能力。這或許是脫胎自有「戰爭中的力學定律」之稱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克氏把精神因素和物質因素比作刀刃與刀柄，且認為主要的精神因素就是統帥的才能、軍隊的武德和作為軍隊來源之民眾的精神力量。<sup>16</sup>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死，同年八月廿日蘇聯宣布氫彈試爆成功，一九五七年八月廿六日「塔斯社」宣佈蘇聯洲際飛彈試驗成功。同年十月四日蘇聯的旅伴（Sputnik）一號衛星升空，十一月三日，旅伴二號獵犬升空，截至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止蘇聯先後發射人造衛星十一枚。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開始發射太空人操縱的「東方一號」衛星，接著是二號、三號……

在此過程中，史達林的軍事思想受到清算。特別是主張奇襲和先發制人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帥和羅特米斯特洛夫（Pavel A. Rotmistrov）裝甲兵元帥的抨擊為烈。不過，索科洛夫斯基的蘇聯軍事戰略第一版（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版），也受到不少批評，因此不得不加以若干修正，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再版。依日本的分析，修正後再版的蘇聯軍事戰略一書，只把第一版上的若干人名刪除，加入了黨的活動，列舉了美國戰力的有關數字，並由於中蘇兩共鬥爭明朗化，刪削了第一版中國古代戰略家的名字。除此之外，和第一版幾乎完全相同，沒有基本的改變。軍事理論雖然比較現實化，但對於如何在將來的全面核戰中取勝，仍屬模糊不明。最終是說要依靠地面部隊將敵國領土占領，才能獲得完全勝利，那是第一版上就有的（二六三、二六七頁），卻沒有說如何把部隊運往敵國領土，而就現實情況說來，蘇聯並沒有那種能力。<sup>17</sup>

黑魯曉夫當政時期起，蘇聯國內在軍事思想方面發生爭論，其主張可大別為四派：

（一）傳統主義者：主張在核子時代，傳統武器及傳統的軍事思想，不會喪失其價值。羅特米斯特洛夫元帥為其代表。

（二）革新主義者：主張在未來戰爭中，核武器具有決定性作用，那時候的戰略目標，是使用戰略攻擊武力摧毀敵國的經

註15 參見列寧全集第廿七卷，一九頁。

註16 同註2。

註17 同註7，四一五、四一六頁。

濟、政治、軍事和行政潛力。因此在國防計畫作爲中，應將這個戰略目標放在第一位，而包括地面和空中兵力的作戰其次。此派的代表首推曾任蘇聯戰略火箭部隊總司令的克里羅夫元帥（Nikolay I. Krylov），此外還有列寧軍事政治學院的彭達倫柯中校（Bondarenko）和屠希克維奇上校（Tushkevich）等比較年輕的軍官。

（三）中道主義者：不反對發展核武器，但認爲在核子時代，傳統性的兵力和武器不僅應該繼續存在，且有繼續加以發展的必要。對新武器過分重視，其危險不下於對它的忽視。這一派的重鎮就是索科洛夫斯基元帥。

（四）政治派：認爲蘇聯軍事權力的根源，一部分寄託在共產黨的領導上，另一部分寄託在武裝部隊和蘇聯人民的團結上。曾任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並當選蘇共中央候補中委的葉比雪夫上將（Aleksy A. Epishev）於一九六六年建軍節（二月廿三日）致詞時說，蘇聯武裝部隊的火力，固然是以核武器爲基礎，但武器還是要人來使用，這些人必須效忠祖國和共產主義，然後方能做完善的軍人。同年底，該派論調即開始流行。抱此觀點者，多爲重視軍人思想訓練的政工人員。一九六八、六九年，總政治部的希爾亞格中將（Shelyag），常引用列寧所說「黨政工作的程度愈深，則武裝力量也就愈強」等話來爲該派辯護。又蘇聯軍中的馬列主義哲學家米羅維多夫上校（Milovidov）也指稱，僅僅注意核子革命的技術方面，而忽視了軍人的思想信仰與精神素質，那將是大錯而特錯。

黑魯曉夫本人是支持革新主義者的。當時若干軍事思想家認爲，未來的戰爭必定是全面性、毀滅性的核戰，交戰雙方沒有勝利者。主張發展核武器，以提高在國際間的發言權，但應竭力避免全面核戰。這種意見獲得黑魯曉夫的支持。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黑魯曉夫在維也納答記者問時說，任何一個小小的局部戰爭，都可成爲引發全面大戰的星星之火。那當然也應在避免之列了。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共產黨人雜誌上，黑魯曉夫發表文章，把戰爭分爲三類：（一）全面戰爭（應絕對避免）；（二）局部戰爭（爲防其擴大爲全面戰爭，亦應避免）；（三）解放戰爭（那是需要支持的）。就是上述主張的表現。

黑魯曉夫重視核武器的發展。一九六〇年他曾宣布裁減兵員一二〇萬。他是忽視傳統兵力和傳統武器的，那當然包括海軍在內。他曾指航空母艦是鐵製的棺材，水面艦艇應送進歷史博物館。過去，蘇聯海軍一直被認爲是地面部隊的助手，長期以來，它只是一支近海防衛隊。一九六二年十月加勒比海危機，黑魯曉夫被迫從古巴拆卸中程飛彈及撤出能攜帶核彈的轟炸機，據說就是由於海軍力量不足，不能支持遠洋作戰所致。受此刺激，蘇聯才致力發展海軍。

六十年代蘇聯軍事思想的爭論，並未因黑魯曉夫的垮台（一九六四年十月）而中止，要到一九六九年以後才稍稍平息。不過，一九六五年秋，蘇共中央主席團（廿三大後改稱政治局）中的國防部派占了優勢，一九六六年的國防預算約增百分之五爲一三四億盧布。一九六六年三月蘇共第廿三次大會，就確立了平衡發展各種武器的觀念。<sup>19</sup>

註① 關於蘇聯軍事思想的爭論，請參閱 Alfred L. Monks, "Evolution of Soviet Military Thinking", 原載美國軍事評論，一九七一年三月號。

在布里茲涅夫時期，蘇聯尖端及傳統武器都有長足發展。一九六七年七月廿八日，即蘇聯海軍節（廿九日）前夕，海軍總司令高爾希科夫（Sergey G. Gorchkov）聲稱：

蘇聯海軍業已變成一支遠程攻擊性部隊……，它在大規模軍事作戰戰場上的武裝鬥爭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在平時也可支援國家在海上的利益。<sup>19</sup>

一九七六年日文雜誌又轉述高爾希科夫的話說：

從沙皇時代起，西方就認為俄羅斯是內陸國或是陸軍國，這完全是歪曲事實。俄羅斯是大陸國同時又是海洋國。實際上，俄國擁有世界各國中最長的海岸線，我們的海岸線長度在美國之上。<sup>20</sup>

這表示，蘇聯已不願以內陸國自居。

蘇聯海軍擁有數目眾多的核子潛艇及其他現代化裝備，於一九七〇年舉行「Okean—70」（大洋七十）、一九七五年舉行「Okean—75」（大洋七十五）兩次大規模作戰演習。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第一艘航空母艦「基輔號」進入地中海。一九八一年八月又在波羅的海集結龐大海軍艦隊舉行兩棲登陸演習。自此蘇聯就擁有一支強大的現代化遠洋海軍，可以進行砲艦外交，足以向英、美的傳統海權挑戰。

一九七五年四月南越淪亡，美國聲望受損，蘇聯飛機在亞非地區大肆擴張。同年蘇聯曾用飛機、輪船運送古巴軍隊至安哥拉；一九七七年以大空運補給軍援物資至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亞丁（Aden）、莫三鼻給的馬普托（Maputo）及其他地點。一九七九年八月運送軍隊和補給品到南葉門和衣索匹亞，十二月侵略阿富汗，其安托諾夫二二型（Antonov—22）及伊留申七六型（Ilyushin—76）等飛機發揮了高度的效率，證明蘇聯已具備充分的空運能力。

武器及作戰裝備的進步，自然會影響到戰略、戰術的改進。

####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使蘇聯衝破「一國社會主義」的藩籬，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大家庭。一九七七年十月布里茲涅夫頒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第四章「對外政策」中的第廿八條，就有所謂：

蘇聯對外政策旨在保證蘇聯共產主義建設之國際有利條件，保衛蘇聯之國家利益，鞏固世界社會主義地位，支持各國人

註<sup>19</sup> 「蘇聯擴張海權的惡兆」，泰晤士報，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

註<sup>20</sup> 轉自菅野博，「美蘇海軍戰略的變遷與現狀」，蘇聯問題調查月報（日本），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出版。



民爭取民族解放與社會進步之鬥爭，防止侵略戰爭，：

這項對外政策的遂行，就需要有強大的軍事後盾。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率華約五國軍隊入捷，就宣示了武裝保衛社會主義陣地的決心。一九七五年南越變色，當時越共是完全依靠蘇聯的支持，那表示後者不再規避局部戰爭。七十年代在亞非的擴張，使支援解放戰爭更加具體而有力。對於核戰的態度，布里茲涅夫也不同意於黑魯曉夫，在他的後期，蘇聯國內似乎已出現核戰可戰、可勝的意見。

傳說布里茲涅夫後期，曾將全國劃分為兩個主戰場，以裡海至烏拉爾山脈為分界線。「西軍」戰場由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兼華沙聯軍總司令庫立科夫（V. G. Kulikov）元帥指揮；「東軍」由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後來升任部長的索柯洛夫（Sergey L. Sokolov）元帥指揮。新武器出現不再先西後東，而是東西同時配備。此說若果屬實，就打破了俄國避免兩面作戰的傳統。

可是，在歷史、地理因素之外，再加上這些要求，那就更非追求數量優勢不可了。此外，攻勢作戰，迂迴包圍、奇襲：，似乎都不曾在蘇聯的軍事思想中被忽略過。

這樣一來，蘇聯就不可避免的捲入軍備競賽的漩渦中。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九至廿二日，美蘇兩國專家在華盛頓集會，會中蘇方透露，蘇聯軍費占其國民總生產（GNP）的比率為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廿五，絕對數字年約二、〇〇〇億美元。<sup>②①</sup>

過去，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援助每年高達一九〇億美元（美國時代雜誌，一九九〇年三月五日）。一九九〇年初期，全球有六十一個以上的國家，積欠蘇聯共約八五八億盧布的債款。<sup>②②</sup>

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以降，蘇聯經濟停滯，一九七九至八二年，成長率接近於零。在工業技術應用方面，落後美國十二至廿年，電子技術、石油化工、儀表與自動化工具部門，落後美國十至十五年。<sup>②③</sup>當一九八三年三月雷根總統提出「星戰計畫」（SDI）時，蘇聯在經濟力及技術方面都無法跟進，那是戈巴契夫不得不改變軍事思想的真正原因。然而，這項改革卻是深、廣而影響極鉅的。它不僅傷及蘇聯政治、軍事思想的枝幹，簡直就在斷喪它的根柢。

首先，他認為全人類的利益高於階級利益。在他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他寫道：必須使政治立場擺脫意識形態上的偏執。<sup>②④</sup>

註②①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五日，第五面。

註②② 南非斐京大學教授尤柏（D. M. Joubert），「論蘇聯解體後對非洲的影響」，中華民國八十一年自由日研究會論文。

註②③ 王憲華、楊福田，「蘇聯『加速戰略』的新五年計畫」，瞭望（中共），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二五頁。

註②④ 戈巴契夫，改革與新思維，中共：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一三三頁。

這樣，就摘掉了共黨的紅色眼鏡。關於戰爭，他說：

克勞塞維茨說戰爭只不過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他的這一公式在當時是經典的，現在則已經完全過時。這一公式只能進圖書館。<sup>25</sup>

核戰爭不可能是達到任何政治的、經濟的、意識形態的目的手段。<sup>26</sup>

這樣，戰爭就不可能再是政治的繼續，因而也就等於動搖了蘇聯軍事思想的基礎。關於戰爭與革命的關係，他說：

過去，戰爭往往是革命爆發的傳爆藥。<sup>27</sup>

當核戰爭的結局只能是普遍毀滅時，我們才作出了戰爭與革命之間因果關係已消失的結論。<sup>28</sup>

戰爭決不是社會革命必要的前提。<sup>29</sup>

這樣，又把戰爭和革命之間的臍帶割斷。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也就給蘇聯卸下了保衛社會主義集團和支援解放戰爭的重擔。

關於國家安全，戈巴契夫提出整體安全、相互安全、對等安全等概念，他說：

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決不能靠犧牲別人的安全來求得自己的安全。<sup>30</sup>

在這種安全概念下，就大可不必去追求數量優勢了。戈巴契夫認為：

在軍備競賽中取勝，以至在核戰爭中取勝，是不可能的。<sup>31</sup>

因此他主張：

軍事思想應該是嚴重的防禦性的。這是和如下一些新的或比較新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如：軍備合理夠用、非攻擊性防禦、消除各軍兵種的不均衡和不勻稱、兩個集團的進攻軍隊集團互相脫離，等等。<sup>32</sup>

在上述種種前提下，戈巴契夫不僅贊成裁軍，而且強調：「裁軍是爲了發展」。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曾訪問印度，和印

註25 同註24，一一一頁。

註26 同註24，一一〇頁。

註27 同註24，一二七頁。

註28 同註24。

註29 同註24，一二四頁。

註30 同註24，一二二頁。

註31 同註24，一一八頁。

註32 同註24，一二二頁。

度總理拉吉夫·甘地簽署了關於沒有核武器和非暴力的世界的新德里宣言。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他引用了該宣言中的一段文字說：

在核時代，人類應該樹立新的政治思維，樹立提供人類生存可靠保證的世界的新構想。人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更安全更公正的世界上。人類應該有一個更好的命運，而不是做核恐怖和核絕望的人質。必須改變業已形成的世界形勢並建立一個沒有核武器，沒有暴力和仇恨、沒有恐懼和疑慮的世界。<sup>33</sup>

日本防衛研究所二部二室室長宮內邦子曾為文將戈巴契夫的軍事思想的發展，依時間分為：

報復抑止與戰略的均衡（一九八五·三〇四）。

安全保障非軍事化與抑止論批判（一九八五·一〇）。

核全廢構想與核抑止理論之否定（一九八六·一〇八）。

和平共存新說（一九八五·一〇〇八七·一一）。

非軍事的、相互的、總括的安全保障（一九八六·二〇八七·二）。

理性的充分性與防禦的軍事思想（一九八七·二〇一一）。

她那篇題為「戈巴契夫政權的新軍事政策」<sup>34</sup>的文章，頗有參考價值。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蘇聯國防部長雅佐夫（Dimitri T. Yazov）在莫斯科會見各國駐蘇大使及武官，說明過去蘇聯把軍事學說看作是準備和進行戰爭的理論體系，現在已不以戰爭作為解決政治目標的手段。他強調蘇聯的現代軍事學說純屬防禦性，它不是為了準備戰爭，而是為了防止戰爭。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三日，雅佐夫在紅星報發表文章，鼓吹蘇聯將以改進武器質量等新的軍事鬥爭手段，對付西方的戰備計畫。他指出要在新思維的基礎上，展開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的改革，那包括改變國家安全的態度，使戰鬥能力達到合理的足夠界限，及擬定陸、海、空三軍最合理的組織形式等廣泛的一整套問題。

蘇聯的軍事思想已變為政策實施，如：片面停止核試、單獨裁軍、從阿富汗及外蒙撤軍、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與雷根總統簽署「中程核約」（INF）、繼續裁軍談判、解散華沙條約組織……。而蘇聯國防部也準備從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〇年，分三個階段進行軍事改革。<sup>35</sup>

一九九一年蘇聯的「八月政變」，使得黨軍關係發生變化，軍事改革中止下來。但新思維下的軍事思想，將會影響到俄羅斯。不過，對於這個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已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納的了。

註<sup>33</sup> 同註<sup>24</sup>，一二三—一二四頁。

註<sup>34</sup> 宮內邦子，「戈巴契夫政權的新軍事政策」，國防（日本），一九八八年六月號，九四—一一一頁。

註<sup>35</sup> 「蘇聯參謀總長莫伊塞耶夫（M. A. Moiseyev）訪問記」，紅星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八日。